

明清洗夫人崇拜与地方经济变迁

刘正刚, 刘 军

(暨南大学 历史系, 广东 广州 510632)

[摘 要] 至少从唐代开始, 洗夫人就成为粤西和海南的主要神灵崇拜对象。随着明清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 洗夫人崇拜在粤西和海南逐渐普及化, 区域经济发展与庙会祭拜形成了良性的互动关系, 庙会有效地整合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各种资源。

[关键词] 洗夫人崇拜; 明清时期; 区域经济

[中图分类号] K248; K2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1710(2006)02-157-05

明清时期,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粤西和海南地区的洗夫人崇拜已成为民间社会的重要活动, 洗夫人庙宇建设几乎遍布城乡墟市之中, 这一现象既是洗夫人祭祀崇拜活动的普及化, 也是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表现。粤西和海南地方经济的发展, 并通过商帮逐步与国内外市场发生密切联系。洗夫人崇拜作为一种地方传统文化现象, 其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与交流起到了积极作用。学界有关洗夫人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 但从民间社会对洗夫人崇拜热潮现象, 来管窥信仰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整合, 却不多见。由于资料的零散, 很难全面地勾勒出洗庙崇拜与地方经济发展的密切关系, 本文只是试图从这一视角作一尝试性分析, 以期引起学界关注地方神灵崇拜背后的经济动因。

一、洗夫人庙建设凸显地方经济发展

洗夫人是6世纪时岭南高凉郡人, 南越首领, 杰出的女政治家。洗夫人崇拜是粤西和海南等地民间信仰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 洗夫人崇拜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各地建立的洗夫人庙。自唐以后, 高凉郡和琼台地区就已出现了洗庙, 民国《续修儋县志》卷4《建置·坛庙》记载:“宁济庙在州署前直街东南坊, 祀谯国夫人冯洗氏。……自有唐来已立庙。”但洗夫人庙建立的高潮应在明清时期, 据学者统计, 电白有洗太庙、夫人庙、娘娘庙、慈佑庙等名目不同而实为祭祀洗夫人的庙宇17座, 化州为29座, 高州为28座, 阳春为3座, 琼山为25座, 琼海为6座, 海南其他地区还有18座。这些庙宇绝大多数都建于明清时期^[1]。

明清时期, 随着粤西和海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 各地建设洗庙不仅数量增加, 规模宏大, 而且这些庙宇的建立多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明清时期纂修的各地方志书的记载显示, 粤西和海南地区的洗庙建筑大多座落在城乡墟市之中, 如光绪《重修电白县志》卷2《坛庙》记载, 电白洗太夫人庙分布在城北长乐街、黄岭墟、观珠墟、水东墟等, 墟市一般为二、五、八期; 光绪《茂名县志》卷2《坛庙》记载, 茂名洗太庙分布在分界墟、顿梭墟、沙田墟、南山墟、大坡墟, 以及梅筑墟东洗庙街、沙坡墟、金塘墟、陈垌墟等, 各墟墟期不同, 有一、四、七期, 有二、五、八期, 也有三、六、九期; 光绪《化州志》卷3《坛庙》记载, 化州洗太夫人庙分布在尖冈墟、壶垌墟、州北播扬墟, 墟期也有一、四、七期或二、五、八期; 光绪《信宜县志》卷2《坛庙》记载, 信宜的洗太夫人庙在怀乡墟、余庆墟, 墟期为三、六、九期。尽管这些洗庙建立的具体时间, 因史料阙如而无法弄清。但从这些墟市的频繁墟期来看, 这一活跃而繁华的市场交易, 与明清时期广东乃至

[收稿日期] 2005-07-11

[作者简介] 刘正刚(1965-), 男, 安徽定远人, 暨南大学历史系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明清史研究。

全国商业经济的发展潮流是相吻合的。而同一地区内不同墟市的墟期交错与间隔,无疑是地方商品交流频繁的证明。这种频繁的墟市交易,既满足了人们趁墟进行商品交流的欲望,也满足了民众乘趁墟之机会祭拜洗夫人神灵的心理需求。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洗夫人庙宇建立于墟市之中,是商业经济社会发展之中的最佳选择。

海南岛的洗夫人庙在明清时期也迅速得到普及,以今琼山县的洗太夫人庙为例,据学者统计,梁沙婆庙建于明代,清代多次修葺;府城柔惠庙建于明代;文山村谯国夫人庙建于清代;三江镇美敏婆庙于清末重建;昆山婆庙建于清;美盈婆庙位于遵潭镇,始建年代不祥;黄兴塘村洗夫人庙、东山墟洗夫人庙、江前婆庙在旧州镇;典弄村婆庙、路巫婆庙、陈村婆庙、崇角婆庙、石窑婆庙、东湖婆庙、太念婆庙在三门坡镇;云龙婆庙、迈操婆庙等均祀洗夫人^{[2]49-52}。这些洗夫人庙不仅建立于墟市,而且深入到乡村,以慈祥仁爱的婆婆形象作为庙名,也越来越贴近民众。乡村修庙需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也要有足够的人口数量。所以,修庙在乡村的普及在一定意义上显示了海南地区在明清时期地方经济获得了较好的发展。乡村社会的庙宇发展也是地方上层通过制造神灵崇拜而有效控制社会的一种手段,海南地区洗庙的普遍建立,与寺庙成为明清时期广大民众社会经济生活的组成部分是一致的^[3]。

明清时期,洗庙在粤西和海南地区各地墟市上的普遍建立,是民间社会对地方经济发展的一种表达方式。据同治《重修慈佑洗太夫人庙碑》记载,高州民间对洗太夫人的祭祀,“自通都大邑以及小市穷乡,莫不庙祀。”从通都大邑到小市穷乡都建立有洗庙,一是因为洗夫人曾造福百姓,二则是当地人口的增加,碑刻云:“阖郡官绅士民,被德沐恩,不可胜纪,而于御灾捍患之际,救民水火,如保赤子,尤昭赫濯。所以建祠奉祀,亦香火万家。”^[4]香火万家或许有夸张成分,但人口大幅度增加当是事实,而人口增加恰恰是传统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人多又是祭祀场所活跃的一个重要因素,光绪《电白县志》卷 2《风俗》记载:每年 11 月 24 日为谯国夫人诞辰,“乡邑多演戏迎神。”而这一庙会活动,已经成为地方社会“农村一大交易场及娱乐场也。”可见,庙会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沟通地方初级市场之间的联系,在更大的层面上推动区域经济的交流与发展。

明清时期,洗庙的建筑选址已充分注意到了民间祭拜和商业交易相结合的互动关系,因为墟市是民间社会交易活动的最重要场所,也是民众往来最频繁的地方。因为墟市交易的活跃,地方官府的财政收入也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墟市的税收,为此地方官府甚至将征税机构也设立在墟市的附近,光绪《重修电白县志》卷 6《建置二》记载,粤海关在水东墟打铁街之西,高州府税务馆在水东墟打铁街之西,电白总埠在水东墟大街,抽厘厂在水东墟北帝庙左。水东墟是清代粤西地区最重要的商业交易中心之一,光绪《高州府志》卷 30《纪述·杂录》记载:“水东墟商舶往来,百货鳞萃。”而这些墟市又都建立有洗夫人庙,在一个比较繁华的墟市之中,既有象征国家统治权力的税务机关建筑,又有民众崇拜的神灵庙宇建筑,这是地方商业经济发展的重要体现。洗庙的庙会活动吸引了大批信众,为各种文娱活动和商品交换提供了最佳机会,也会进一步刺激地方经济的发展。

当然,地方经济的发展是刺激洗夫人崇拜热潮形成的重要物质基础,各地洗庙大多有庙产,主要分为田租或墟租,咸丰《琼山县志》卷 5《建置五·坛庙》记载,海南琼山县洗太夫人庙“一在苍兴一都,……置田为祭费。”光绪《高州府志》卷 9《坛庙》记载,电白县宝山下洗太庙于嘉靖二十六年(公元 1547 年)在旧址重建,“每岁遣官致祭,有城壕、校场两处开垦田租,及马塌石墟租以供祭事。”高州府的洗庙位于东门外,嘉靖十四年(公元 1535 年)建,有庙田每年收租 22 石。每年春祭,还从茂名县支付“均平银 4 两 4 钱,制镀金花 2 枝,重 3 钱 5 分,办品物供祭。仲冬 24 日诞辰,支均平银 5 两 6 钱,制镀金花 2 枝。”而茂名县的洗庙也一直拥有较为富裕的庙产,光绪《茂名县志》卷 2《建置·坛庙》记载,“洗庙资产有沙坡墟田租 25 石,白铺田租 20 石,南塘龙窝村田租 86 石,圳口龙桥也有田租。”

随着地方经济的发展,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也在进一步加强。明朝以来,国家控制乡村社会的最主要的手段之一就是民间信仰纳入到国家正统神灵祭祀范围。明代官府对洗夫人的崇拜活动承袭以

往的朝代,始终抱着支持肯定的态度。据《大明一统志》记载:“本朝洪武初封为高凉郡夫人,岁以仲冬 24 日祭之。”朝廷遣官和地方民众一起致祭,至少反映粤西和海南地区的发展已明显有了起色,官方对洗夫人崇拜活动的重视,无疑会刺激洗庙的祭拜热潮,既进一步强化国家对地方社会的控制能力,又不断刺激地方经济的发展。明清时期洗夫人庙建筑规模宏大,数量繁多,围绕着洗夫人庙的民间庙会活动也十分活跃,这些都需要大量经费来维持,表明地方经济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

二、庙会与区域经济的互动

明清时期,洗夫人庙大多建在墟市上,是粤西和海南地方经济发展的一道风景线,一些墟市由乡村小型的集市中心而发展为具有区域性的地方贸易集散中心地,如茂名县的梅篆墟就一度成为“岭西一大都会也,南北商贾聚此交易”^①。而梅篆墟在明末清初的王朝更替战争中,屡遭兵燹,直到康熙时期才渐渐恢复元气,光绪《高州府志》卷末《补遗》记载,时人盛赞梅篆墟“富丽甲下粤,舟车凑若辐。”梅篆墟是粤西地区著名的商品交易集散地,在一定程度上也得力于建立在这里的洗夫人庙的祭拜活动。围绕着洗庙祭拜活动而形成的旺盛人气,街道也在庙宇周围产生,光绪《茂名县志》卷 2《坛庙》记载,梅篆墟就有东洗庙街的交易场地。由此可以判断,在粤西及海南地区的洗夫人庙附近,由于有众多信徒的祭拜,围绕着这些祭祀活动,会渐渐形成借助民间信仰搭台,商家利用这一机会在墟市上开发商机,街道也因商业需要而不断发展,光绪《茂名县志》卷 10《道路》记载:郡城北关街道“商贾列肆居比庐,长街迢迢。”

明清以来,每年农历 2 月,是海南和粤西地区举办洗庙活动的高潮期。琼山一带在此月都会举行以洗庙为中心的军坡节活动,这一活动吸引了周围数百里的人前来参与,场面十分热闹。咸丰《琼山县志》卷 5《坛庙》记载,每逢洗庙盛会,“数百里内祷祈者络绎不绝,每逢诞节四方来集,坡墟几无隙地。”琼山县在明清时期是海南地区洗庙建立最多的县之一,而且军坡节的活动是围绕在墟市中的洗庙展开的,因祭拜人数太多,以致墟市显得非常拥挤。同样,粤西的电白县在每年正月举办的洗庙祭祀活动期间,也是远近的行商、小贩、手工艺者等纷纷涌入各地庙会,借助洗夫人庙会时的喧闹场面,开展商品交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以洗庙为中心的定期庙会活动,实际上已经成了区域文化物资交流的固定交易会活动,庙会对方经济的发展和地方经济产生了积极的效益。

为了宣传造势,各地庙会还想方设法吸引民众参与,其中祭祀时的演戏无疑是最吸引人的一招,所以一些规模较大的洗庙都建有专门的演出戏台,如海口得胜沙的洗太夫人庙,由当地商民捐资兴建于咸丰四年(公元 1854 年),引人瞩目的就是这座洗庙前筑有固定的石戏台,每年农历 2 月初 9~12 日的庙会活动期间,都会举办演戏、舞狮、戏龙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娱活动。观赏文娱节目,向洗夫人神像烧一柱香火,祈求好运,而在香烟袅袅的祭拜活动中,庙会经济已经给地方社会发展带来了客观的效益,定安县潭榄村谯国夫人庙,每年农历 2 月举办庙会活动,“庙会期,各县行香者云集,舟车络绎,士女殷轸,溟南第一赛场也。”^{[2]49-52}庙会期间,男女混杂的场面,是明清政府最头痛、也是干预最多的问题之一,但收效甚微。而男女老少齐赴庙会的场面,对商家而言,又恰恰是难得的商业致富的机会。可见,庙会期间,当地乃至周围不同县份大量人口的高密度汇聚,刺激和带动了庙会相关产业的兴旺。

明清时期,粤西和海南的区域间贸易往来十分活跃。两地贸易的形式主要是输出各地的土特产,尤以海南特产输入内地为主,据康熙《琼山县志》卷 1《物产》记载:“琼多异物,果如槟榔、椰子;材如花梨、凤眼;香如沉水、油速,皆中土所无,而琼独产之。”这些特产输入内地,至少在明代已十分普遍,明人邱浚在《琼台会稿》卷 7《学士庄记》记载:海口已是“帆墙之聚,森如立竹”的繁忙景象。输入内地市场的土特产以槟榔为大宗,《广东新语》卷 25《木语》记载:“槟榔产琼州,……诸州县亦皆以槟榔为业,岁售于东西两粤。”槟榔税也成为海南岛财政的重要来源,有学者对道光《琼州府志》卷 14 记载的海南各州县税收进行

① 参见《高州府志》卷 54,陈兰彬等编撰,1890 年刻本。

统计,槟榔税高达2 670.1两,居于海南各种税收之首位^[5]。尽管笔者没有发现第一手史料能说明粤西、海南的商业贸易和洗庙建立与庙会有多大的关联,但是,明清时期,粤西及海南地区每年一浪高过一浪的祭拜洗夫人神活动,与这一时期繁忙的商业景象相重叠,极有可能使得地方官府、贸易商人在地方经济繁荣、商业利益驱动的各自因素影响下,共同利用民间祭拜洗夫人神灵的庙会活动,来各取所需地分享利益。

实际上,明清时期的商人已经出现在粤西及海南各地的庙会活动中了,据光绪《高州府志》卷6《形胜·风俗》记载,吴川县的芷藁港,每年正月以后,福建、潮州等地的商人船只都停泊于此。而二月正是粤西与海南各地举办洗庙活动的高峰期,福建与潮州商船在这个时候来到粤西地区,与庙会活动不无关系。商人的介入既刺激地方经济的发展,也使得庙会活动日渐奢靡,吴川的黄坡镇也位于出海口,因商人云集,地方“生意颇盛,而赛神会集,渐趋奢侈。”是书卷末《补遗》记载,梅篆墟也是清代粤西地区最重要的贸易交流中心之一,“墟之富庶甲于西岭”,市场上米谷、鱼盐、板木、器具等一应俱全,福建漳州商人通过海洋,“春来秋去,以货易米,动以千百计于此。”据前述分析可知,梅篆墟不仅有洗庙,而且围绕洗庙还形成了交易的洗庙街,福建商人在春季到达梅篆墟,此时也是洗庙庙会活动的时期,商人以货交换当地农家的米,大约都是在墟市的墟期进行,洗庙祭拜时的狂欢,也是商人借机收购米粮的最佳时期。高州府地处广东、广西和海南经济往来的交汇处,“襟巨海而带三江,接雷廉而引浔梧。”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与明清时期海洋经济发展相吻合,而随着商业的发展,当地人的重利轻义明显抬头,光绪《高州府志》卷6《形胜》记载,濒海一带出现了“人多器讼,信巫而谄神,重利而轻义”的现象。多讼重利是商业社会重要特征之一。

以洗庙为中心的庙会活动,加强了区域间的经济交流活动。庙会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也得到了国家的认可与肯定,明清两代对洗夫人的加封在前代的基础上有所发展,隋封洗夫人为谯国夫人,宋封其为显应夫人,明封为高凉郡夫人,清封为慈佑夫人,历代王朝的不断加封,使洗夫人崇拜已由民间地方神灵升格为国家的正统神灵,王朝的加封,使得洗庙神灵的威力得到增强,信仰圈也会随之扩大。王朝不但对洗夫人名号进行加封而且还遣官主持修缮洗庙并致祭,地方志多记载有官员于每年春秋率僚属致祭并修葺庙宇的史实。官府的这些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会刺激洗庙活动的活跃。明中叶以后,洗夫人祭祀和庙会活动的频繁与火爆,正是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表现,文人士大夫用诗歌的形式记录了这一实况,明代进士王弘海在《天池草·谯国洗夫人庙诗》中描述了洗庙祭祀活动的盛况:“岁时伏腊走村氓,祝厘到处歌且舞。迩来豺狼日纵横,青天魑魅群妖精。愿仗神威一驱逐,阗境耕凿康哉宁。”^[6]地方百姓载歌载舞祭拜体现的歌舞升平景象,其实是展示了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地方社会安康、宁静的环境,又被民间社会附会为是洗夫人护卫的结果。这二者的互动使得洗夫人被民间神化的色彩愈益浓厚,民间不断演绎洗夫人对地方社会发展的各种神话故事,光绪《高州府志》卷54《杂录》记载,电白县旧址夫人城的城砖小而光泽如硯石,相传为谯国显圣所筑。另在县城洗庙地窖中储存的陈旧大米,据说用来煎汤服食,可防治瘟疫。在海南地区,据正德《琼台志》卷41《纪异》记载,儋州旧城濒海,每遇水患,都会得到洗夫人的庇佑。人们对洗夫人不断神化,使其成为地方百姓的万能保护神灵。而神灵是需要通过庙会的祭祀仪式来象征表达的,这又在无形之中对地方商业贸易、休闲娱乐及社区等实施了整合功能。

总之,明清时期粤西和海南地区利用民间宗教信仰普及的趋势,顺应形势发展,以当地特有的洗夫人信仰文化传统为基础,在城乡各地尤其是墟市周围建立了众多的洗庙,并以洗庙为基础开展庙会活动,这既是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反过来又刺激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加强了区域经济的交流。但是,由于粤西和海南地区的商业活动主要由外地商人主宰,本地商业团体缺乏强势参与的实力,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洗夫人崇拜向更广阔的区域扩散,只能局限于粤西与海南地区,没有像福建商人那样因经商足迹遍布海内外,进而将天后信仰带往世界各地。但是洗夫人崇拜作为一种传统地方信仰文化的现象,其对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与交流有着积极作用,官民热心于祭拜洗夫人的庙会活动,其背后的商业动机与社区整合功能是不容忽视的,庙会与商机的互动,最终促进了区域间的商品交流及地方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 [1] 张磊. 洗夫人文化与当代中国[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11.
- [2] 陈雄. 洗夫人在海南[M].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
- [3] 赵世瑜. 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M]. 北京:三联书店,2002:68-70.
- [4] 谭棣华. 广东碑刻集[M]. 广州:广东高教出版社,2001:604-605.
- [5] 杨德春. 海南岛古代简史[M]. 长春:东北师大出版社,1988:138.
- [6] 王弘海. 天池草[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38册. 济南:齐鲁书社,1997:341.

[责任编辑:张文光]

On Correlation between Worship of Madame Xian 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during the Ming and the Qing Dynasties

LIU Zheng-gang, LIU Jun

(Department of History,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Abstract: Madame Xian has become the main God of worship in Western Guangdong and Hainan Island ever since the Tang Dynasty. Following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such worship practice was gradually popularized in the afore-mentioned regions. Moreover,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se regions and the temple fair came to form a mutually beneficial relationship. As the two regions became more attached to other domestic markets, the temple fair proved to have effectively integrated the various resources for the benefit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se regions.

Key words: the Ming and the Qing Dynasties; worship of Madame Xian;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